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

发展是 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

杨建文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杨建文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

ISBN 7-80681-078-1

I. 发... II. 杨... III.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393 号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作 者: 杨建文

责任编辑: 惠 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3

插 页: 2

字 数: 6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500

ISBN 7-80681-078-1/A · 001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三个代表”与“第一要务”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发表了著名的“高州讲话”。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随后，江泽民在5月的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期间；6月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和10月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及在2001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里，都反复地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新时期新实践中更好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因此，我

们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之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

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系统论述,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中作出的。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以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讲话实际上为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制定了一条总揽全局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为已经进入新世纪并且继往开来迈开了新长征步伐的亿万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行动纲领。因此,无论对于我们党的现实发展需要,还是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贡献,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一”讲话发表以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以及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5.31”讲话)中,不仅再度强调了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一定

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提高到是否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高度,提高到能否成为执政党第一要务的高度,提高到能否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高度,是江泽民“5.31”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要求。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已经逐步构成并将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现在,又进一步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了出来。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我们认为,“第一要务”既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三个代表”要求的必然结果。

那是因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新世纪条件下的历史使命是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带领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大业,因此,必须始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但是,执政党的“先进性”究竟体现在哪里,保持“先进性”的动力和途径又来自何方,问题最终还是归结到“发展”问题上。首先,无论什么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性,总需要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保持和实现。只有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才可能是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只有敏锐地把握住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实在地推动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才能称得上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其次,先进文化同样如此,它需要在发展中得到积累,需要在发展中得到创新,需要在发展中得到发展。我们党只有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先进文化,并且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才能称得上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后,如果谈到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更是一个发展的范畴。不仅是因为人民的利益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而且还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得到实现。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社会发展退化了,那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根本不可能得到体现,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也就根本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结为一点: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坚持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第一要务”就是要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只有把发展放在所有问题的首位,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才是真正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深刻领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丰富内涵。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有可能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提供十分重要的理论保证和实践指导。

目 录

序言：“三个代表”与“第一要务”	1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
1.1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1
1.2 历史使命与现实奋斗	8
1.3 历史使命与核心任务	14
二、客观上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19
2.1 生产力的性质特点	19
2.2 生产力的运行规律	28
2.3 走出几个认识误区	31
三、发展始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36
3.1 中国发展问题的由来	36
3.2 中国发展的当前特征	40
3.3 中国发展的环境变化	44
3.4 中国发展的现实要求	47
3.5 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	50
四、发展要有新思路	56
4.1 坚持发展路线	57
4.2 深化体制改革	58
4.3 改变分配方式	62

4.4	扩大对外开放·····	63
4.5	优化经济结构·····	68
4.6	注重可持续发展·····	72
4.7	实行科教兴国·····	75
4.8	提高人的素质·····	80
后记·····		85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 ▶ 历史使命与现实奋斗
- ▶ 历史使命与核心任务

为了加深对“第一要务”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以及加深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更深层次理解,我们有必要对发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从而增强我们贯彻落实“第一要务”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自觉性。

1.1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发展,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显示了人类社会如何在自身内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下,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在现代社会,“发展”一词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多的概念之一。但是,

人们对于“发展”一词含义的界定和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为此还曾经出现过激烈的理论争论和长期的政策分歧。如果从认识层面上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根源可能还是在于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理解存在着狭义认识与广义认识的不同。

所谓狭义的发展概念，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无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理论，还是各国政府的发展政策，一般都是基于这种对发展理念的狭义认识。在战后的实践过程中，也确实推动了全球五六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狭义的认识至少存在着三个缺陷：其一，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诸多社会经济条件的配合。如果没有政治稳定、科技创造、教育基础、法制环境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短时期里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比较容易，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增长奇迹，但马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增长障碍，要想进一步实现经济现代化就非常困难了。其二，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没有同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管理体制和风俗习惯，尤其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没有改变。结果，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能够转化为社会公众的福利和社会文明的进化。尽管也出现了许多巨富，出现了一些豪华，但穷人甚至比以前更穷，贫困化甚至比以前更甚，这就是 70 年代初倍受指责的

“没有发展的增长”^①。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拉美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有,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矛盾非常突出,经常激化,甚至导致政变不断,独裁群生。其三,经济的急剧增长过度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严重污染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而也就有了《罗马俱乐部报告》关于“世界末日”的惊人预言^②,出现了“经济增长极限论”和“可持续发展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上曾经出现过一次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大争论和政策大调整。不少人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摒弃了原先那种把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开始形成了关于发展的广义认识和深度理解。70年代最为时髦的发展观,就是把发展问题广义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另外还有些人将发展定义为“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环境保护”。这也就是说,根据当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和运行规律,我们不能撇开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发展的广义内涵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内容在内的全面进步。

① 这个概念最初由罗伯特·韦内、克劳尔等人提出,他们以利比里亚为例,认为其经济虽然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结构变革而未能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由于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而未能使社会各个阶层分享到实际收入增长的得益。

②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由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完成的研究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的一百年内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出现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D. L. 梅多斯:《增长的极限》(197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0页。

认识到发展的狭义概念与广义概念之间存在的区别,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但是,无论狭义概念还是广义概念,之所以能够先后出现和同时并存,是因为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必要性。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特点,确实存在着一个能否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真研究。

首先,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在“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时候,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全面把握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也就是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发展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所谓的发展,应该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发展。那是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经济发展就更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也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不仅如此,还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兴旺、民族昌盛、人民富裕、社会进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以及社会关系的完善上,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

工作时特别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进程。我们不能以经济发展来否定社会发展,也不能以社会发展来否定经济发展。作为我们“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应该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三者之间内在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在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进一步突出一个“第一性”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其现实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第一性,它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由此可以作进一步的延伸,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前进的动力。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废黜GDP”^①,引起过很大轰动。也有不少人进一步发挥,甚至提出“有必要为了更好的分配和更多的平等而牺牲(经济)增长”,也有不少国家将发展的主题从经济增长

① 这个口号是由当时的国际劳工组织常任主席大卫·莫尔斯在1970年9月提出的。他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并不能说明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如何分配的,以及究竟哪些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利益。参阅R·罗宾逊和P·P·斯特里顿编:《70年代就业机会展望》,HMSO图书出版公司1970年英文版,第8页。

转向了其他的社会目标。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突然放缓;由于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抵御外来冲击能力的削弱。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走势也就在 70 年代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五六十年代的总体上升变为八九十年代的总体下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陷入了“黑暗的十年”或“迷茫的十年”。国际学术界随之出现了直接针对 70 年代“社会发展目标论”和“社会结构主导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复兴”,出现仍然以经济增长为主线,但自觉地将经济增长放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来考察的“现代经济增长论”。直至今日,这两种理论仍然在学术上占有主导地位,在发展实践中构成政策制定的基础。

因此,我们无论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发展实践的角度,都可以明确地将问题归结为:在认同广义发展概念的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一生曾经有过两大历史性发现,其中第一个就是揭示了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无论在什么人类社会里,无论在什么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存在的最一般条件,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动,才带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个道理对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在我国目前所处的

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强调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演绎过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同样会遵循这个规律继续发展下去。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党的建设),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首先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第一个也是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实施“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时,最为重要的也应该是经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有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发展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解决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才会坚定地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江泽民才会不断地讲,“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②我们在迈开新长征第一步的时候,首先做的也就是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② 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

经过了 20 多年的努力奋斗以后,为了使我国国家能够在新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于国际竞争之中,就更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保持长期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努力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1.2 历史使命与现实奋斗

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也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已经走过 80 多年战斗历程了;中国改革开放自进行以来,已经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奋斗了。无产阶级政党所做过的事情难以计数,所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论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都应该不断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制度上或体制上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 20 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为中国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自主地位,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了全国各族亿万人民,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根本性变化,再度起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三中全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意义。那么,三中全会的核心是什么?是拨乱反正,是思想解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何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解放,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两个基本点,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把我们工作的中心点转过来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全党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才有可能出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可能提出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模式,才有可能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的风云突变和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使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险风恶浪面前没有动摇,没有退缩,没有改变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以及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思想。所谓三个有利于,指的是我们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换一句话讲,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三个有利于”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三个有利于”还是“发展是